

美食的路上。

从勒紧裤腰带,到凭票购买,从空空的菜篮子,到“天天过年”的百姓饭桌子,从追求精细粮食再到粗细粮搭配重新成为消费时尚,改革开放四十年,中国人对吃的追求发生了从量到质的飞跃转变。

四十年的时间,我们从计划用粮到大鱼大肉,最终走上了轻食时代。一方小小餐桌上的“大逆转”,见证了我国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不断迈进的时代变迁,也反映了我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。

## 吃不着, 买啥都凭票

“现在‘90后’、‘00后’估计都不知道粮票是什么了吧?也不会理解,为什么有钱却吃不到饭,还必须要粮票。”谈起吃的变化,今年65岁的董淑惠一见到记者就打开了话匣子,“最明显的变化,肯定就是原来吃不着、吃不饱、吃不好;现在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,还不敢多吃了。”

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道出了饮食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转变。

改革开放前和初期,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。说起那段岁月,董淑惠感慨万千。那是一段较长的短缺经济时代,各种物资极度匮乏,市场供应严重不足。“粮油米面、鸡蛋、肉等食品都按人口数量定量供应,凭票证购买,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。即便买个豆制品,也要带副食品购买证,划号、剪角才能买到。”董淑惠回忆道,以粮票来说,按照年龄、学龄、工种、居民等进行分配的,最初给人的感觉就是“变种”人民币,“但在那个时候,即使你有再多的钱,如果没有粮本粮票,你是一粒大米也买不回家。而且由于粮食供应不足,你能买到的大米也是有比例的,粗细搭配。城市居民每户一个购粮本,上面确定人数、购粮时间,每月购粮明细,一本流水账,记录着上月节余和累计节余情况,只能节余,不允许赊账。粮本、粮票就跟命根一样,有了它们就可以到指定的粮店买粮,那时粮店的大米价格是几角,面粉价格是几角,这个价格一成不变地一吃就是二十多年。”

拿董淑惠家来说,全家四口人,除了父母之外,还有她和姐姐,“我们家当时条件还可以,而且饭量都不大,每个月都会有节余。但像我同事家,男人多,饭量大了,每月的定量粮票就常常不够用,所以当时我们单位补贴的粮票,我都送给她了。记得有一阵子,粮店里不时有山芋供应,一斤粮票可以购买七斤山芋,那对于粮食紧张的家庭就是福音了,代价就是得到



最后的老虎灶。2003年7月,上海蓬莱路北梅溪弄,生柴火的“老虎灶”,附近居民来泡开水。摄影/雍和

信息要赶紧奔赴粮店排队去。”

在董淑惠的印象里,肉类主要以猪肉和鱼肉为主,“牛羊肉根本见不到,鸡鸭一般只出现在逢年过节的餐桌上。”至于蔬菜的话,选择还是挺多的,青菜、萝卜、鸡毛菜都有,“但北方常见的大白菜在上海比较稀少。如果听说第二天菜场有卖的话,凌晨四点多,我妈就会拖着我到菜场门口排队。”

大概从1980年代开始,生活物资渐渐丰富起来了,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,最明显的是一日三餐副食增多,主食就自然减少了。这时,家家户户的粮票大多有所盈余,于是,上海市内的苏州河上,近郊农民划来的小船靠岸后,悄悄出现了用农村捎来的“鸡蛋换粮票”的营生,随后又慢慢滋生出粮票换塑料制品、日用品,人们通过这种“易货贸易”的形式,按需互补。

“这种行为在那时是不允许的,但也没人管,我妈也会偷偷用粮票去换鸡蛋。”董淑惠告诉记者。

不过,即便改革开放初期,物资渐渐丰富起来,但全国各地街道上还经常可以看到排成长队的购物“长蛇阵”。尤其是北方冬天,冬储的白菜、土豆、萝卜仍是百姓餐桌的绝对主角。那时候,冬天储菜往往全家出动,在国营蔬菜店前,早早就排起了披着棉大衣的人群,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搬运白菜的人和三轮车。

当然,逢年过节,家家户户能有点加量。董淑惠说,在上海,加量一般依据家庭人口多少,分成大户(五人以上,含五人)、小户,发给可购数量不等的节日补助鱼票、肉票和补助油票等等。被尊为甲级的牡丹、散发着香气的凤凰牌香烟,还有被列为乙级的大前门香烟,节日期间凭票也都能多供应几盒。